群众路线与政治整合： 社会领域党的建设的 路径研究

焦长权 陈 锋

内容提要 目前,社会领域中的党员数量已超过了公有制单位中的党员数量,并且他们主要分布在中小企业之中。党员在社会领域中的分布具有高度分散性、流动性特征,党的建设和单位业务工作也基本分离,这给党的建设提出了巨大挑战。但是,社会领域广泛分布的党员和党组织,也给党和国家深入群众、联系群众提供了新的路径,其中的关键在于重新激活群众路线,将党组织建设成为人民群众与党和国家展开制度化沟通的桥梁,进而将社会领域的政治社会主体纳入国家政治生活,实现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有效政治整合。

关键词 党的建设 群众路线 政治整合

DOI:10.16091/j.cnki.cn32-1308/c.20240319.001

研究问题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①同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专门论述了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党的建设在三者中处于关键地位,毛泽东将之称为一项“伟大的工程”,其目的是“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1—652页。

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① 党的十九大报告则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②

可见,作为一个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③强调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建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同时,在不同历史时期,随着国内经济社会环境、党的历史任务以及党组织成员构成等方面的变化,党的建设也面临不同的任务和挑战。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就指出,“我们党的党员,在最近两年内增加了二百七十多万人,在最近五年内增加了四百七十多万人……这就是说,两年以下的新党员占了党员总数的将近一半。在五年以内,我们党发展了四倍以上的新党员”。^④ 无论是对农村和老解放区党组织的巩固和党员的教育,还是在城市、区以及其他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发展党的组织,都对党的建设提出了很大挑战。^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大规模的党组织和党员分布在体制外的社会领域中,他们具有高度分散性和流动性,党的建设和单位业务工作的关联性也较弱,这给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重大挑战。比较而言,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基本都是松散的政治组织,不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也缺乏严密的基层组织。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党的建设则是在一个流动性很低、组织化程度很高的计划经济环境中展开的。当前,中国共产党需要在一个快速流动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建设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同时又密切联系群众的政党。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社会领域党的建设进行了进一步部署,提出要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理顺行业协会、学会、商会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⑥ 为此,中央决定组建社会工作部,其重要职能就是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统一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工作,协调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⑦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对新时代社会领域党的建设可能路径展开论述。我们尝试从政治整合这一理论视角出发,将其与群众路线的理论传统相结合,对社会领域党的

①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2—614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③ 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的说法,可参见唐皇凤《使命型政党:执政党建设的中国范式》,《浙江学刊》2020年第1期;冯仕政则将这种由党所领导和缔造的,具有高度革命使命性和教化性的政治体制,称为“革命教化政体”。参见冯仕政《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

④ 刘少奇:《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49页。

⑤ 刘少奇:《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59页。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⑦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人民日报》2023年3月17日。

建设问题进行框架性的阐述。

西方政党政治研究的反思

政党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英国学者约翰·马利尔特所言,任何试图分析政府结构的著作,要是不涉及政党的组织和历史,无论如何都是不完整的。^①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政党是现代政府的缔造者,尤其是民主政府的缔造者,它们不是现代政府的附属物,而是现代政府的核心,扮演着决定性和创造性的角色。^②

(一) 现代政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

尽管不同学者对政党的内涵和功能聚讼不休,^③但还是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政党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一方面,政党直接联系着民众,对大众公共意愿予以凝聚,并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对其进行代表(represent)、表达(express)、引导(channel)和沟通(canalize),作为“民意的传送带”把混乱的公共意志组织起来。^④另一方面,政党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信息表达和传递的工具,若仅如此,它完全可以被民意调查等技术手段所代替;政党总是试图在控制政府或影响政府决策方面发挥作用,它不仅能将公共意志组织起来传达给政府,而且能够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有关公共意志转变为公共政策。^⑤因此,政党是把“大众的偏好转变为公共政策的基本公共机构”,^⑥是一种试图通过占有政府职位来寻求其在国家中的影响力,以“凝聚不同的社会利益”的组织机构,是“有组织的意见表达者”(organized opinion)。^⑦

可见,现代政党主要承担的便是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政治整合功能。政治整合具有多方面的内涵,其中一个关键的方面是:如何将大众公共意见有力吸纳整合进国家体制,把社会中的主要政治社会主体通过制度化的渠道纳入国家政治生活,“保持政体和社会之间的畅通”。^⑧为确保来自社会的粗糙的要求和输入能够最大限度流动,就需要有一种低层次的加工处理过程,将这些粗糙的要求加工成一种表达要求的共同语言,并把它们转化成数目相对较少的可供选择的公共政策。政党就是承担这种加工处理功能的最重要主体之一,它是现代政治体系中最有特色的政治综合机构。^⑨

(二) 政党与社会关系:类型与模式

由于政党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政党与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

① 林尚立:《执政的逻辑:政党、国家与社会》,《复旦政治学评论》2005年第三辑。

② 谢茨耐尔:《政党政府》,姚尚建、沈洁莹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4页。

③ 戴蒙德等:《政党与民主》,徐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利昂·D·爱泼斯坦:《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商务印书馆,2014年;G. Sartori, “Party Types,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28, No. 1(2005), pp. 5-32.

④ 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8页。

⑤ 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6—59、82—86页。

⑥ 李普塞特:《共识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第126—128页;V. O. Key, Jr.,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Knopf, 1961.

⑦ 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11页。

⑧ 阿尔蒙德:《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任晓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7页。

⑨ 阿尔蒙德:《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任晓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5—36页。

政党研究的核心命题。

韦伯很早就指出,从组织目的来看,政党可分为“分肥型政党”和“理念型政党”两种类型。在“分肥型政党”中,党员的主要目的是将党魁推向国家领导地位,从而自己可以通过领袖得到分配的官职。这种政党没有根本性的政治原则和理念,主要是为了选举动员,美国的政党分肥制是典型的例子。理念型政党的组织目的是实现党员的政治理念和原则,德国走向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民主党是典型的例子。^① 迪韦尔热则根据政党的组织机制将政党分为精英型政党(cadre parties)和群众型政党(mass parties)。精英型政党主要由少数享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政治精英组成,这类政党往往是国会议员及其政治网络的松散政治同盟。群众型政党则拥有健全完整的政治组织,通过对社会的动员形成较大的组织规模,而且在政党组织之外还紧密联系着许多其他社会团体,譬如妇联、青联、工会、农会等。^② 安格鲁·帕尼比昂科进一步提出了群众科层型政党(mass-bureaucratic parties)和选举专业型政党(electoral professional parties)的划分。^③ 群众科层型政党与群众型政党内涵相似,增加科层这一后缀主要是强调它形成了复杂的科层组织结构。选举专业型政党主要是指 20 世纪中后期的西方政党组织。政党越来越成了一个纯粹的选举机器。

在此基础上,学者对不同类型政党进行了诸多比较研究。^④ 研究发现,在不同政党中,区别最明显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型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迪韦尔热等提出群众型政党、群众科层型政党等概念,主要也是为了把握马列主义政党的核心特征,^⑤但在论述过程中都将其作为选举型政党的陪衬来对待,并未对马列主义政党的主要特征进行全面准确的论述。

根据列宁的经典阐述,马列主义政党主要有三个核心特征。首先,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无产阶级“最先进和最坚决”的部分。其次,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具有严密的组织形式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最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与群众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保持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⑥ 与马列主义政党相比,选举型政党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组织松散,尤其是没有严密的地方和基层组织。比如,美国的政党之争基本只存在于联邦和州一级的政治机构中,在州以下的地方政府中,政党的色彩几乎就不存在了。而且,州一级以下也很少有政党的基层组织;即使有,除了在大选之年有较多活动外,其余时间也处于休眠状态。美国政党的内部组织也非常松散,在党内团结上表现出相当低的水平,没有需要

①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 2 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565—1566 页。

② 迪韦尔热:《政党概论》,雷竞璇译,香港青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 年,第 61—66 页。

③ 参见安格鲁·帕尼比昂科《政党:组织与权力》,周建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

④ 阿尔蒙德:《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任晓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36—37 页;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42 页;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11—129 页;李路曲:《论欧美政党组织形态和权力结构的变迁》,《政治学研究》2007 年第 4 期。

⑤ 向文华:《西方群众党类型理论述评》,《教学与研究》2014 年第 3 期;聂运麟:《现代群众性政党的五个新特征——西方国家共产党组织形态的历史性转型》,《人民论坛》2013 年第 24 期。

⑥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37—338、342—343 页。

严格遵守的一套思想体系或政策目标,党内权力结构也非常分散。^①

西方学者一般将选举型政党构成的政治体制称为政党体制,将马列主义政党构成的政治体制称为党国(政)体制。^②他们认为,就政党发挥利益组织化和政治整合功能而言,政党体制和党国体制具有一定相似性,但二者也存在显著不同。在政党体制中,政党体系是一种表达性交流,即民众能够与国家进行双向交流。而在党国体制中,政党只是一个为政府向社会传递信息而设计的单向交流网络,或者叫权威性交流。前者通过创建一个相对自主的政党体系,提供一个控制国家的表达性交流体制,由此政党体系把民众和政府连接起来。后者则是通过创立一个控制人民的权威性交流体系把政府和民众连接起来。因此,政党体制被认为是一个自由(自主)沟通的体系,其中表达超越了压制而遍及整个政治体系,而党国体制则被解释为一个强制性(垄断的)沟通体系,在这个体系的每一个环节中,压制都超过了表达,他们因此又将其称为“威权型党国(政)体制”。^③

这代表了西方学者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党国体制的典型看法。这种看法在早期以极权主义理论范式为核心,对苏联及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分析。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苏联解体,这一理论逐渐演变为所谓“威权主义”范式,并创造了诸多以“威权主义”为主语的理论概念。^④总体来看,这一分析框架起源于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预设了国家和民众之间的支配-反抗关系,将中国也纳入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框架中进行理解,并由此将中国共产党简单认定为一种管控型的“威权”组织,将中国也简单纳入完全控制、压制社会的“威权国家”范畴。但是,西方学者所建构的这一“威权”组织的理论图像,虽然在相关研究中长期具有笼罩性的影响,但并不符合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实际关系模式。

要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必须回到群众路线的理论传统。王绍光认为,群众路线不仅是共产党传统中的民主决策方式,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代表方式,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核心所在。^⑤美国学者沃马克则将群众路线为特色的中国体制称为“准民主体制”(quasi-democratic system),群众深度参与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⑥因此,我们不能简单以西方“威权型党国体制”理论视角来理解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群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不应被视作一个“国家”或“政府”的管控型组织,被设想为一个与社会对立的组织,它实际是一个同时带有国家与社会互动性质的组织:一方面,它高度“嵌入”社会;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它当然也与非政府的社会不同。^⑦

在社会领域,我们尤其不能将党组织简单理解为一个控制型组织。比如,在“两新”组织

^① 荣敬本、高新军:《政党比较研究资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4页。

^② P. Lewis, "Party States and State Parties", in R. Katz and W. Crotty, (eds.), *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 London: Publications, 2006, pp. 471-474. 景跃进认为,党国体制的概念带有一定意识形态色彩,容易引起误解,他因此提倡以党政体制概念来代替。参见景跃进《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③ 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进明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5页。

^④ 景跃进:《“选举”何以成为“威权”的修饰词——选举概念的重构及新政体分类》,《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5期。

^⑤ 王绍光:《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

^⑥ B. Womack,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Revolutionary and Post-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China and Vietnam", *World Politics*, Vol. 39, No. 4 (1987), pp. 479-507.

^⑦ 黄宗智:《国家-市场-社会:中西国力现代化路径的不同》,《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1期。

(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对它们就不再是一种如单位制中一样的全面领导关系,党组织对其具体业务也不会直接干预。在社会领域,党组织应该能更加切实发挥“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的作用,真正成为典型的“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者”。^①换句话说,党组织在社会领域能够更加发挥一般性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政治整合功能。

社会领域党的建设面临的挑战

与公有制单位相比,社会领域党的建设面临一些特殊的挑战。

首先,社会领域中党员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在典型的非公有制经济单位中,人员的流动性很强,党员的流动性也很大。比如:2016年,北京市B区通过转移党组织关系转入党员11121人,约占在职党员总数的七分之一;其中转入非公有制经济单位10527名,约占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在职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可见,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党员的一个突出特征是高度的流动性。党员在不同单位、不同地域之间快速流动,导致党组织关系也不断变动,少数党员甚至在一个企业只工作几个月时间,党组织关系刚转入又得重新转出,这给党组织建设和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其次,社会领域中党员具有很强的分散性。中小企业和个体户是城市非公有制经济就业的绝对主体,大多数党员也分布在中小企业中。比如,2016年,北京市B区共有27921名党员分布在27692家非公有制企业中,平均每家仅1名党员左右。从业人员50人以上的企业,每家企业平均党员人数不足3名;从业人员100人以上的企业,平均每家企业党员人数也只有4名左右。在26957家私营独资企业中,每家企业平均只有党员1.04名。95%以上的非公有制企业无法单独建立党支部,只能与其他企业一起建立联合党支部,每个联合支部平均覆盖近10家企业。可见,在非公有制经济单位中,党员的分布高度分散。在非公有制企业中,70%的党员在从业人员5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中就业,即使在从业人员100人以上相对成规模的企业中,平均每家企业拥有党员也只有4名左右。在社会组织中,194家民办非企业单位中有123家建立联合党支部,597家律师事务所中也有410家建立联合党支部。可见,绝大多数建有党组织的非公有制单位只能建立联合党支部,每个联合支部覆盖近10个单位,显然这给党支部的日常活动和建设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

最后,在社会领域中,党的建设与单位业务工作关联性也较弱。在公有制单位中,党的领导是最重要的组织机制,党的建设与单位业务工作紧密相联,甚至经常是党组织通过领导业务工作来展开党的建设,是一种“单位制党建”模式。^②但是,在非公有制单位中,党的建设与单位业务工作的关联性较弱。有的企业甚至认为,党组织建设给日常业务工作带来了一定干扰,因此党员职工只能在周末或节假日进行党组织活动。同时党员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单位还要求设置专职党务工作人员,一些企业觉得这成了一个负担。因此,如何在党的建设和单位日常

^①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85—986页。

^② 唐文玉:《从单位制党建到区域化党建——区域化党建的生成逻辑与理论内涵》,《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工作之间建立有效关联也是一个挑战。

针对社会领域党的建设,中央提出了“两个全覆盖”的要求,即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要求符合建立党组织条件的企业和社会组织要“应建尽建”,暂时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要通过选派党建指导员等方式实现党的工作全覆盖。这是“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原则在社会领域的具体体现,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企业跟军队一样,一通到底”。^①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中的触角,是党整个肌体中的基本细胞。通过“两个全覆盖”,党的组织体系渗入了社会领域的各个角落,形成了一张覆盖全面、贯通上下的组织网络。因此,社会领域党的建设虽然面临多重挑战,党的基层组织在一些地方也比较薄弱,但这仍然为进一步强化这一组织体系提供了一定基础。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在社会领域中的广泛分布,既能弘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有效杜绝社会组织腐败现象的发生,又给党在新时代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和凝聚群众提供了新的机遇和空间。^②

这正如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指出的:我们党现在共有五百八十万党员,所有这些党员,在全国各方面建立了约二十五万个基层组织。我们的党不只在上层,在各方面领导着我们的国家和各种事业,而且在下层,在各种工厂中、矿山中、农村中、机关和学校中、部队的连队中密切地联系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使我们党具有充分广大的群众性。一方面,我们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正确领导着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另一方面,我们党又在组织上密切联系着广大人民群众。这就是我们党具有无穷的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源泉。^③

群众路线与政治整合

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主体,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是相互交织的两条主线。^④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核心使命是通过政党实现政治整合:一方面,在经历了传统势力和军阀组织的整合失败之后,最后由具有现代性的高度组织化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有效整合,成为现代国家和社会的缔造者;^⑤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有效吸纳和回应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公共诉求,并通过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将其转化为公共政策,也将不同社会主体纳入国家政治生活。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不同社会主体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国家有效回应公共需求,并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将各类社会主体有效纳入国家政治生活,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良性沟通,是有效实现政治整合的关键。总体而言,单位制中的个体通过单位组织仍然保持了与公共组织

^① 参见林立公《试论两新组织党的建设》,《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5期。

^② 潘修华、李天天:《社会组织腐败内部治理的制度困局及其化解》,《廉政文化研究》2022年第4期。

^③ 刘少奇:《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47—148页。

^④ 参见邹悦《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页;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汪晖《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29页。

^⑤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9、341页。

的有效连接,而社会领域中的个体则缺乏一种新的制度化的机制与公共组织展开有效关联。^①因此,国家如何有效回应城市社会结构的巨变,将社会领域的广大社会经济主体有效纳入国家政治生活,无疑是国家政治整合面临的新的问题。当前,国家对社会领域大众公共需求的吸纳和回应主要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代表机制,但不少研究表明,这一机制所表达与综合的公共需求仍然相当有限。^②

社会领域广泛分布的党组织和党员,正好可以成为党和国家与社会展开良性沟通的组织基础。与数量有限的两会代表委员相比,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社会领域所覆盖的深度和广度都明显更强,而且基层党组织在开展社会调研、联系群众等活动的频率和多样性方面也具有显著优势。发挥社会领域中的党员及党组织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之优势,把分散在群众中的各种公共意见予以有效吸纳和综合,必将形成党和国家进行科学决策的巨大财富。

因此,把党组织建设成为党和国家联系群众、深入群众和凝聚群众的枢纽,让党组织成为群众利益表达的制度化载体,应该是社会领域党的建设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党的组织体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予以吸收、转化、凝聚和综合,再通过党的领导,将其转化为国家公共政策。如此,社会领域中党的组织体系就能进一步成为党和国家“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的制度化通道,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者”。^③

社会领域党组织的这种功能定位,也与广大群众和普通党员的认知相一致。比如,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对上海市古美路社区的调查显示:66.7%的居民认为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应体现在“及时了解、反映群众需求”;从社区党员的自我认知和定位来看,66.1%的党员认为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应体现在“及时了解、反映群众需求”。^④可见,无论是社区居民还是党员都认为,及时了解和反映群众需求是社区党组织凝聚力的主要来源和党组织的重要功能。

要实现社会领域党的建设的上述目标,党的群众路线仍然是最有力的理论武器。群众路线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群众观点”,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二是“群众工作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法”的统一。只有有了坚定明确的“群众观点”,才能形成工作中明确的群众路线。践行群众路线的最终目的,则是“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⑤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在一切工作中践行群众路线,其核心目的就是实现党与群众之间的双效良性沟通,进而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整合。

在这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无限循环”过程中,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处理好少数积极分子与广大普通群众之间的关系。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

① 张静:《通道变迁:个体与公共组织的关联》,《学海》2015年第1期。

② 张静、董彦峰:《组织分化、政治整合与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文化纵横》2018年第4期。

③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85—986页。

④ 韩福国:《开放式党建:协商民主与群众路线的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2页。

⑤ 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6—348、354—356页。

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如果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与其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①

因此,领导者要注重和善于团结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组成领导骨干,更关键的是要使他们与广大群众密切结合起来,去吸引和推动中间状态和落后状态的群众,让大多数群众都能自觉地跟随党的领导而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不能“使积极分子从中间和落后状态的群众中孤立起来”,^②那样就会脱离广大群众而成为“少数人的空忙”。

目前,社会领域党的建设的主要工作还是吸纳“积极分子”。党员是社会领域中的“先进分子”和“关键少数”,在社会领域中发展党员并将他们有序组织起来开展党组织活动,只是吸纳和整合了其中的“先进分子”,是实现社会领域政治整合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更关键的是通过党员和党组织这一组织化的“先进部队”,去充分深入社会和联系群众,将更广大普通群众吸纳和整合进国家政治生活之中。

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几亿被侮辱被损害的饥寒交迫的奴隶升到了主人翁地位,他们通过党的领导参与到了国家政治生活中来,形成了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绝大多数人对极少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的专政。^③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正是把群众路线作为自己“根本政治路线”和“根本组织路线”的中国共产党把亿万普通老百姓第一次带上了政治舞台,让他们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④

亿万普通人民群众之所以能够被纳入国家政治生活,最主要是因为作为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能够真正践行群众路线,“先进部队”能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而不是脱离群众独自跑到前面,甚至于被群众孤立起来。这正如列宁反复强调的:共产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⑤因此,社会领域中党的建设不仅要有效吸纳和整合其中的“先进部队”,同时还要让他们真正充分深入社会和联系群众,而不是从群众中脱离出来甚至被群众所孤立,从而通过他们将广大普通人民群众纳入国家政治生活之中,以真正实现有效的政治整合。

在社会领域党的建设中,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塑造“群众观点”。刘少奇指出,“我们同志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群众工作方法的政前前提。只有明确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具体群众工作才会有正确的方向。可见,与西方政党政治中的政治整合和公众参与机制相比,群众路线的理论传统不仅是一种吸

①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9页。

② 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7、356页。

③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1页。

④ 王绍光:《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

⑤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3页。

⑥ 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54页。

纳精英的“精英整合”,更强调精英与普通人民群众之间的实质政治关联。“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工作方法,是实现将广大普通人民群众纳入国家政治生活的具体策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才是最终的政治目的。群众路线所指涉的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不仅是作为“先进部队”的精英群体,更是最广大的普通人民大众。

结论与讨论

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巨变,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在传统公有制单位中,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治生活相对延续了改革开放前的特征,党、国家和社会之间通过制度化机制进行组织和整合。而在社会领域,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治生活则需要通过新的机制予以组织,党组织不再能通过对单位的全面领导来实现政治整合,党组织和党员在社会领域中虽然大量存在,但组织生活和组织体系较弱。

为应对城市社会结构的巨变,我们要重塑国家政治生活,要从实质上将新的经济社会主体纳入政治体制中,实现有效的政治整合。在推进社会领域党的建设过程中,需要重新弘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社会领域中庞大的党组织体系能够成为党深入群众、联系群众的制度化渠道,党和国家将通过这一组织化通道有效吸纳和凝聚群众的公共诉求,并最终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领域展开党的建设和政治整合的努力,也可以为世界范围内的政党政治提供新的选择空间。当前,全世界政党政治的一个共同危机是,政党日益脱离其所依赖的大众和社会基础,逐步丧失了对民众进行政治吸纳和整合的功能。比如,西方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均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也大幅下降,几乎所有欧美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继续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①以政党为基础的民主也变成了不见其“民”的空头民主。中国共产党既深度嵌入社会又高度组织化,西方政党理论很难对此进行准确的解释。

在社会领域中,中国可以通过高度组织化的党组织体系达成对社会领域的政治整合。在这个过程中,党组织成了回应和吸纳大众公共诉求的制度化通道,社会和国家通过政党实现了有效政治整合。

作者简介:焦长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北京,100871;陈锋,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124

〔责任编辑:毕素华〕

^① 王绍光:《政党政治的跨国历史比较》,《文化纵横》2018年第4期;汪晖:《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